



明清 「湖广填四川」 移民会馆建筑研究

胡斌
陈蔚 著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MINGQING
HUGUANG
TIAN
SICHUAN
YIMIN HUIGUAN
JIANZHU YANJIU



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从明清入川移民史研究入手,以与移民社会生活关联性最强的移民会馆建筑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文献梳理、数据分析、田野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从绪论开篇,以会馆文化与会馆建筑形制及其嬗变、“湖广填四川”移民与四川地区移民会馆空间分布、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聚落空间与景观构建、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建筑营造地域特色、移民建筑文化与四川会馆建筑、四川地区会馆观演空间与戏台的阐述顺序,梳理总结出明清时期长江上游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作为时代性背景的移民活动及移民性社会影响下的四川地区城市、城镇、村落和建筑文化生态整体发展的基本脉络,指出这种潜在的移民文化基因,已经成为四川(巴渝)地区建筑文化地方性特征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之一,在今天的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建筑创作中都应该关注和理解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会馆建筑研究 / 胡斌, 陈蔚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2.11

ISBN 978-7-5689-3441-1

I. ①明… II. ①胡… ②陈… III. ①会馆公所—古建筑—建筑艺术—四川—明清时代 IV. ①TU-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18051号

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会馆建筑研究

MINGQING “HUGUANG TIAN SICHUAN” YIMIN HUIGUAN JIANZHU YANJIU

胡斌 陈蔚 著

责任编辑 张婷

责任校对 王倩

版式设计 张婷

责任印制 赵晟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饶帮华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400千

2022年11月第1版 202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3441-1 定价: 14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51878083, 52278004)资助。

前言

社会实在在任何时空场景下都是整体呈现的，而不依从于解释水平。

——杜瓦斯

会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出现的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并且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基层民间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它是“馆”的一种特殊形式，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至民国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会馆的演变及其长时期的繁荣昌盛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口的杂居化分布，传统农耕乡土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四民群体的时代变迁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从单纯的同乡互助性质的义举，在更加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逐渐演进成为一种较具适应性的社会管理模式。它的发展演进历史性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基层的自治与中央集权的间接控制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社会形势变迁的不断适应。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市与集镇，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会馆设会目的的不同、服务人群的差异，会馆类型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明清以来，由于受到“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人口迁徙流动幅度之大、涉及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成为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内外交流的重要载体。会馆作为各籍移民同乡聚会联谊和商议之所，从物质空间生产角度，对移民社会的形成、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阶段性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四川地区移民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见证；并且，会馆建筑以其突出的公共建筑形象，成为明清时期四川传统城镇聚落文化景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而目前四川各地保留下来的一百多处会馆历史建筑遗存，正是我们深入理解这种类型建筑，进而研究清代四川地区传统聚落和建筑整体特征最重要的历史标本之一。

与其他类型建筑不同，会馆建筑作为产生并盛行于明清的公共性建筑之一，一方面受到自身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另一方面还承担着文化保持和传承的作用。这些因素都会对建筑空间、形态和技术产生影响。四川地区会馆建筑既物质化地表明了会馆所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意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清以来各方移民文化在四川地区所处状况和它们所经历的发展演变过程。对它的认识和探索是从更深层文化含义理解四川地区传统建筑文化谱系来源和南北杂交性特征的重要途径。这种认识基础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四川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变通性、务实性特征也有很高价值，进而对认识“四川人”有更加正面的推动意义。而以对特定历史时期典型性类型建筑

研究为出发点,旨在从点到面展开对地区建筑历史整体面貌和精神内核的研究,也拓展了地区建筑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

本书从以下几个主要部分就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社会与会馆建筑文化的整体形态进行研究。

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阐释我国会馆文化内涵与四川地区会馆文化的区域特征以及与本地区人文历史环境的关系。会馆从移民团体自发形成的民间互助机构发展到后来广泛介入地方公共生活,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公共性民间组织,其背后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根源是其决定性力量。要完整剖析清代四川传统城镇中这种典型的“半公共性空间和建筑类型”的建筑本体意义和深层的文化价值、历史意义,跨学科和宏观视角是本研究的基础。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利用翔实的原始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数据,借助统计学和图像分析方法,就四川地区会馆类型、数量、时间等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反映出来的文化问题进行剖析。从分析移民迁徙的路线和各籍移民分布的空间状况出发,揭示移民与会馆分布之间的历史关系。

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在详细考察会馆建筑在城镇中的选址和分布状况基础上,将会馆在空间地理分布上的特征、会馆建筑在城镇中的选址策略与对明清时期四川城镇聚落的景观形态特征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及精神空间的构成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会馆建筑作为移民利益团体的“物质和精神象征物”在清代四川传统城镇聚落物质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方式。揭示隐匿在城镇形态和物质空间结构背后的社会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观念。

从环境适应论、文化决定论和文化传播学等多个角度,结合大量的实地测绘资料和模型分析,对四川地区会馆建筑在形态学层面的“地域性和地缘性”特征,以及在装饰艺术和营建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系统研究。通过数十个现存的不同类型、不同地点的会馆建筑实例的多角度比较,主要以多方移民集中性迁入、长期商品贸易所引起的多元文化交融和文化要素迁徙流变的时代性和地方性机制,以及在会馆建筑中呈现出来的多样表现形式进行剖析,揭示明清时期的四川文化作为汇聚四方文化精神的杂交型文化形态,如何在人类最重要的物质产品之一建筑的层面,尤其是移民会馆建筑中体现出这种独特的文化“水库效应”。

目 录

第1章 会馆与会馆建筑基本形制及其嬗变	1
1.1 会馆的起源	1
1.1.1 会馆与馆	2
1.1.2 会馆与会	4
1.2 会馆发展演变与类型特征	5
1.2.1 会馆的分类	10
1.2.2 会馆的空间分布	15
1.2.3 会馆的蜕变与衰落	18
1.3 会馆的功能与文化内涵	19
1.3.1 会馆核心功能：“答神庥、联嘉会、笃乡情”	19
1.3.2 会馆的社会管理功能	21
1.3.3 会馆的文化内涵	23
1.4 会馆建筑基本形制及其嬗变	27
1.4.1 会馆建筑的来源	27
1.4.2 会馆建筑基本形制	29
1.4.3 会馆建筑布局 and 空间组织方式的演绎	33
1.5 小结	43
参考文献	43
 第2章 明清移民与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地理空间分布	 45
2.1 明代移民与移民会馆的早期兴建	45
2.1.1 明代移民的动因和分布	45
2.1.2 明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的早期兴建	46
2.2 清代移民历史及移民人口地理空间分布	48
2.2.1 清代移民历史背景和特点	48
2.2.2 外籍移民入川的迁徙方式及路线	50
2.2.3 清代四川地区各籍人口地理分布特征	57
2.3 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的地理空间分布	60
2.3.1 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的建设	60
2.3.2 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分布的总体特征	64
2.3.3 各籍移民会馆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	65

2.3.4	清代四川地区土著川主信仰与川主庙的空间分布	68
2.3.5	清代四川地区典型行业会馆的空间分布	
	——以盐商会馆、王爷庙为例	70
2.4	小结	80
	参考文献	81
第3章	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聚落空间和地景构建	82
3.1	移民与清代四川地区社会及文化变迁	82
3.1.1	初期五方杂处的文化状况	82
3.1.2	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83
3.1.3	杂交型文化的形成	84
3.2	移民与清代四川地区城镇的崛起	84
3.2.1	传统中心城市的复兴重建	85
3.2.2	新型地区性城镇的崛起	87
3.2.3	场镇的大量兴建	90
3.3	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聚落空间结构及形态变迁	94
3.3.1	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公共空间”的发展	94
3.3.2	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聚落空间结构演变	100
3.4	移民会馆与清代四川城镇人文景观的重建	107
3.4.1	清代四川城镇人文景观的建设	107
3.4.2	移民会馆在选址兴建中的独特文化意象	111
3.4.3	会馆文化脉络的地理标示	
	——四川城镇和街巷名称中的会馆	121
3.5	小结	121
	参考文献	122
第4章	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建筑营造地域特色	124
4.1	四川移民会馆建筑布局形态的地域性	124
4.1.1	会馆建筑的“择址定向”	124
4.1.2	会馆建筑“合院天井式”平面布局	128
4.1.3	会馆建筑单体的环境适应方式	136
4.2	四川移民会馆建筑造型形态的地域性	141
4.2.1	因势赋形、巧于因借	141
4.2.2	融于自然、质地朴素	146
4.2.3	利用对比、形象鲜明	148

4.3 四川移民会馆建筑空间形态的地域性	151
4.3.1 “路径”组织	151
4.3.2 空间“层次”	155
4.3.3 丰富“界面”	161
4.4 四川移民会馆建筑营建技术的地域性	164
4.4.1 山地建筑接地技术	165
4.4.2 大木构架地方技术	172
4.4.3 屋顶组合与屋面地方做法	183
4.4.4 歇山屋顶地方做法	189
4.4.5 檐部做法	193
4.4.6 墙体做法	195
4.5 小结	201
附录	202
参考文献	202

第5章 移民建筑文化与四川会馆建筑 203

5.1 移民建筑文化在四川地区传播衍化的总体特征	203
5.2 四川会馆建筑封火墙形态的多源杂融性	204
5.2.1 封火墙的源流及南方地区封火墙主要形态	204
5.2.2 封火墙在赣、鄂、湘地区的传播与形态演化	211
5.2.3 四川地区会馆封火墙的主要样式	216
5.2.4 四川地区会馆封火墙形态的地缘、地域特色	221
5.3 四川地区会馆建筑装饰技艺的多源杂融性	224
5.3.1 会馆建筑装饰题材及文化内涵	224
5.3.2 会馆建筑装饰图像的建筑性审美	227
5.3.3 会馆建筑装饰技艺的地缘性特征	232
5.3.4 会馆建筑装饰技艺的地域特色	235
5.4 四川地区会馆观演空间与戏台	240
5.4.1 川剧的形成发展与“湖广填四川”移民	240
5.4.2 四川地区会馆观演空间构成	243
5.4.3 四川移民会馆戏台形制与尺度分析	246
5.4.4 四川移民会馆的“山门戏楼”	251
5.5 小结	256
参考文献	257

第1章 会馆与会馆建筑基本形制及其嬗变

会馆，《辞海》释义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1]。就单字看，“会者，会面聚合之意；馆者，指接待宾客的房舍以及公共娱乐、饮食旅居之场所”^[1]。在中国历史上，会馆和会馆建筑有明确的使用上和形态上的特指性，远超过单字的简单组合。就其意义的复杂性，目前学界普遍认可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以下几种：“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2]；“会馆是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建都北京之后，发展于明朝中叶嘉靖、万历时期，并逐渐在全国的通都大邑兴起，清朝已达到它的兴旺时期，差不多有异乡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就有会馆的出现”^[3]；“所谓会馆，系寓居异乡城市中同一乡贯的官绅商民所建的馆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外出商民不断增加，城市中土著与非土著矛盾日渐加剧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组织”^[4]等。其中第一、第二两种定义主要从移民同乡联络乡谊的角度思考会馆的组织意义，代表了会馆最初的起源。而第三种定义主要从中国商品经济萌芽与商人移民群体的利益维护角度分析会馆这种中国特殊的前商业行会组织的意义，代表了会馆发展后期的主要特征。综合来讲，会馆是出现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侨寓的同乡或同业人员为联络乡谊和维护共同利益，由民间倡议建立的，在城镇商品经济发展和各类社会公共事务中都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基层民间社会组织和建筑类型。会馆具备馆所建筑并遵守各自公约规制。

1.1 会馆的起源

会馆的出现究竟始于何时呢？《辞海》中的会馆条目引用了明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的观点：“……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1]此书也是目前学界认可的提及会馆较早的史料。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我国会馆的出现大约始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但具体日期已不可考^①。究其兴起之根源，说法众多，王日根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会馆史》提出，“会馆的出现首先是作为流寓士大夫的乡聚组织，后渐渐服务于科举，服务于工商”^[5]。此观点基本涉及会馆起源之主要因素和组织方式的基本特征，史料依据主要是对北京会馆起源之考证，代表了目前学界会馆源自京城试馆这一主要观念。但是，这种说法在解释为何会馆这种社会组织和建筑形式在明清短短几百年时间在中国各地城镇如此普及，又伴随我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在民国中期以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其背后更为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层面还略显不足，尤其是更为隐秘的民间社会复杂混

① 近人翟兑之在《北平湖广会馆志略后记》一文中说：“京师之有会馆，昉于汉之郡邸。”“推其原始者，或云永乐已有之。”与刘侗资料在年代上有差异。

乱的祀神文化、商人文化、帮会文化对会馆起源的影响几未涉及。在综合目前最新研究成果和大量有关地方性会馆起源的史料基础上,结合词源学角度的理解,本文对中国会馆之缘起从以下层面予以分析。

1.1.1 会馆与馆

“馆”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注云:客舍也,从食官声;“接待宾客、寓居的房舍”^[1]。

“馆、驿、舍和店”四大类,是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提供饮食旅居建筑的称谓。馆在中国出现最早多为官办。《周礼》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由此可见,早在周代,便有了专供朝聘之官旅途食宿的驿馆。《诗经》和《左传》的记载证实,战国时期馆舍已经普遍使用。《诗经·郑风·缁衣》中这样描述:“适子之馆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闾闳,厚其墙垣。”汉时的邸(客馆)专供进朝觐拜的官吏居住,属于较高贵的食宿场所,也为官办。如汉长安薰街的蛮夷邸,归属九卿之一的大鸿胪管辖,专门接待外国商贾和官吏。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之后,在皇城之南曾建造四夷馆,分别为扶桑馆、崦嵫馆、金陵馆、燕然馆,用以招待临时来自东西南北的外族或外国宾客使臣。沿袭这样的做法,四方馆和鸿胪客馆成为隋唐时期接待与管理四夷贡使的馆舍与机构,同时还有吏部所设的进奏院。到宋代建有都亭驿、都亭西驿、礼宾院、怀远驿、同文馆以及朝集院等。辽南京(今北京)科举昌盛,官办馆驿也相当发达,除陪都殿东招待使臣的永平馆外,北门外有望京馆,至古北口,中途设有金沟馆。出古北口至中京,中途设有新馆、卧如来馆、柳河馆、打造部落馆、牛山馆、鹿儿峡馆、铁匠馆、富谷馆、通天馆。馆与馆之间距,少则20公里,多则40公里,为人所能承受。这些馆为往来使臣、客商、举子提供了寄宿条件。元明时期建有“会同馆”;清代建“会同四译馆”等。

除以上官办渠道的馆舍外,汉文帝以后,民间因商贸或者集会议事等所需,在一些商业发达、商人较为集中的城市,以商人为主体的逐渐兴起一种被称为“郡邸”的建筑类型,与会馆的某些功能颇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普及,并随着封建政权继续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逐渐式微。南北朝之后,由于各地交流往来增多,民间开办的旅馆成为街市上为普通来往旅者提供食宿服务的地方,它们一般被称为邸店、客店、食店、旅店等。宋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这样描述:北宋都城汴梁城内,州桥东街巷迄东,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役,皆于此安泊……此时还出现了服务专门类型客人的客店。宋《为政大要》中载:“茶坊、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中也有关于旅店的记载:“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旅店各立行老。”可以看出这已经是兼具堆货和商店、客舍性质的市肆。但即使如此,民间却少于对馆的直接使用。由此可见,馆固与店、舍同类,但是在使用上有差异。馆一般是作为官方开办的高级专门性接待及管理场所而存在,如馆驿^[6]、馆第(府第)^[6]以及夷馆等。它的规模等级较高、功能更加综合多样并且有固定房舍建置。主要功能包括“接待、食宿、娱乐外以及办公、议事甚至学校等”^[7],后者最著名的就是明朝的“四夷馆”。

除了从典型使用功能的角度对馆的定义,在历史语境上不可忽略的是另外一些馆的出现。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离宫别馆,弥山跨谷”所描述的馆是指专为诸侯国君们游乐狩猎时临时驻跸使用的;而颐和园中的听鹂馆、园林中的馆,仅指精巧的单体建筑。可见馆者,并没有严格的类型界定,使用和形态上的随意性很大。

明清时期,会馆的出现是馆在类型上的发展。这一点,20世纪刘致平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就曾概括性地提出:“在早间很多的馆是用作招待宾客的地方,像诸侯外宾朝贡,各地行旅宿食地全设有馆,如四方馆、宾馆等。明清以来各地的会馆是馆的较大形式。”^[8]之所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从会馆的基本使用功能分析,它作为异地同乡停留寓居之所,所提供的接待留宿、议事宴饮等服务与馆驿无异。这一点,在目前留存下来的某些会馆建筑布局中还可窥一斑。从大量史料看出,会馆虽由民建,却是地区势力的代表,更加上其中官宦势力的存在和影响,使它具备更多的底气。会馆大多数建造精巧、巍峨、雄伟,配得起“馆”之称谓。史料记载会馆可以被借用做官家驿馆使用,据《成都掌故》描述:“成都燕鲁公所是燕(亦称冀,河北省)、鲁(山东省)两省合建的会馆,它规模大,式样亦好。清代,皇帝派来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到成都,地方行政官员为他洗尘,饯行和‘做生’(四川方言,指庆贺生日),都在这里举行。”后期,不少京官到地方巡行由会馆直接留宿接待。历史上还发生了清末京官端方巡视重庆住在湖广会馆,几乎被反清的民众活捉的事件。

但是会馆与驿馆、夷馆等在设立之初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最核心在于对服务对象的选择和要求。店对所有旅客开放,基本不论身份;驿馆、夷馆主要为官方的公务人员及其亲属服务;会馆则仅供同乡、同籍、同业者联络聚会或寄寓。地缘和业缘是会馆建立之基础,由此,会馆的使用范围有限制,管理也较为严格。明人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四中有《嵇山会馆唐大士像》一文中就说:“……盖都中流寓士著,游闲士绅……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也就是说,入住会馆,需要查清籍贯,是否属于同乡,流动的是否有正当的行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会馆自开始就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它的非营利情况使它已经迥异于普通意义上的旅馆客店。在这一点上看,它应该是从历史上有类似功能萌芽的特殊性机构逐步发育而来的。例如,汉代京城长安已有的外地同郡人的邸舍,唐代在京师为吏部所设的进奏院(专为各省、州、府官绅来京居住之用),宋代在京师为同乡人所设的朝集院及南宋杭州专为外郡同乡人谋利益的场所等。其产生的核心都在于:专门的人群使用、基于特定关系的互助性行为,既有公益性方面也有基于建立利益共同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意向。它是费孝通先生在《乡村经济》中提出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层级结构在异地和不同社会人群(普通同乡、官僚阶层、商人阶层)的发扬。最初的会馆可能存在于商旅往来颇多的京城和各地主要城镇,以提供同乡商贾之间的互助联络为主,规模影响都较小,也并不普遍。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正式命名的会馆和会馆建筑作为独立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和建筑类型出现了。以此为认识基础,历史上第一处会馆到底是京城赶考同乡举人寄宿之所还是同乡商人集会聚集之所就不那么重要了。

1.1.2 会馆与会

如果说,会馆与馆的关系主要从使用功能考证其联系,那么会馆中作为定语的“会”进一步明确了会馆是“为一定目的而成立的团体或组织”^[6]。它是会馆产生之真正的思想和精神根源。京城和大中城市中的会馆源于社会中上阶层互利互惠的积极愿望,其目的指向性明确,而地方城镇乡村的会馆,它们在组织建设过程中,行为仪式的安排上与地方名目繁多的“会”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推论这些会馆在建立之初是直接借鉴了民间结社集会的基本形式,会馆中独特而固定的神灵崇拜也是源于中国地方社会广泛流传、延绵不绝的浓厚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传统。这一体系代表了以普通中下层民众为主体的阶层的所喜所惧、所依所持,有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进而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和生活行为习惯。

在中国供奉神灵、纪念先祖、祭祀先贤有着久远的传统。历朝历代各地都有国立、官立的宫观神庙以及不可胜数的民间所建的祠庙,所祭祀的对象按照功利原则因人因地而异名目繁多。传统神庙中的神灵主要分为四大统系:最重要的是宗教性神灵系统,包括道教神系和佛教神系;其次是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特色的政统神系和民俗神系。前者主要分自然神和人格神,自然神如天、地、日、月、星辰、五岳、四镇、四渎、风雨雷电等;人格神如伏羲、女娲及尧舜禹汤等前代帝王,以及一些文臣武将、义士孝妇和烈女等。后者大致分自然神,如山、林、水、花神等;动物神,如狐仙、马王、牛王等;物品神,如床、门、灶、井神等;人格神,如大郎、小郎、仙姑、仙师等;行业神如鲁班、药神、戏神、狱神、窑神等。另外还有盛行于各地的地方性先贤神,如黑神、帝主等地方性先贤人物。

对于前两种系统有专门的寺院、道观供奉。后面几类或者得到国家认可得以普遍崇祀,如天地、五岳等;或者随着时代发展因统治者宣扬主流道德观念、树立社会道德典范的需要,有些祭祀对象的地位还被不断提升,如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天后林默等。而民间社会祭祀拜神之风,有聚众滋事、传播不利言论和异教邪说之嫌,历代朝廷多以淫祠加以取缔,不予鼓励。另外,出于对以血亲关系发展起来的宗族地方势力扩张的担忧,清乾隆以来,朝廷对那些并非人人可远溯同一祖先的拟血缘同姓联宗和异姓联宗,进行严厉谱禁与祠禁,认为其是造成伦理秩序破坏和聚众借势的祸端。虽然如此,民间设会结党之风却屡禁不止,至明清以后愈烈,为躲避禁令和迫害往往以其他形式避难。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广东巡抚张彭祖奏请朝廷取缔禁毁当地的拟血缘联宗祠堂,一时间,广东各地联宗祠纷纷改名书院或书室避难,明其志为照顾族人科举服务^[9]。从这种历史背景可以想见,会馆的出现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承担了各地民间地区性集体宗教活动和建立社会团体的需要,它的兴盛除了经济原因,还与清代中后期政府对民间宗教信仰所持的一种逐渐开放的态度有关。

从会馆供奉的神灵类型可以看出,它既包括宗教神系和政统神系中的典型性人物,如道教许真君、佛教南华老祖、先贤关羽大禹等,也涵括了民俗神系中的行业神和地方先贤神。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会馆的文化精神根基要远早于明清,应该与历史悠久的民间行业神崇拜和地方先贤崇拜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以此为思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庙馆合一和宫馆合一的现象,进而推断出

行业会馆与唐宋时期即出现的行业祠庙,如药王庙、蚕业祠的关系,以及移民同乡会馆和地方性集体圣贤崇拜之间的关系。如湖广会馆禹王宫可能脱胎于历史更为悠长的禹庙,江西会馆万寿宫可能脱胎于明代兴起的万寿寺,四川会馆川主庙脱胎于秦代以来即兴建于四川各地的李冰庙、二王庙等。

因此,大量散布各地的会馆,其起点绝非单纯从京城传入各地,而是在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市民社会发育前期,新兴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的组织行为。它以地方小众神灵信仰和会为基础。通过研究会馆祭祀功能的形成和祭祀模式和地方神灵崇拜之间的同源关系可以得出更加详尽的结论。而这种起源说也可以佐证为什么在某些地区,如四川地区,会馆多数不称会馆,而多称宫、庙;也或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清时期会馆在中国地方社会分布如此之广,会馆的兴建如此之盛。

1.2 会馆发展演变与类型特征

会馆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渐兴起始于明后期至清代康乾、咸同年间发展至顶峰。在地域分布上遍布全国并波及海外,北至东北、今内蒙古等地,南至闽、桂、越、台,东至沿海,西至甘肃、康藏、青海及新疆等地区都有会馆存在。与此同时,各地会馆数量虽不均,但是总量惊人。据统计,政治中心北京曾有会馆共计567处¹,比较集中的前门地区就有86所²(图1.1);明清江南商业中心苏州城“为东南一人都会,五方商贾,辐转云集,百货充盈,交易所得,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分馆”^[10],共有会馆公所48处³。各省省会及中心城市大量兴修会馆,每城会馆数量多达几十所。如河南全省会馆总计约200余所,省城开封从顺治年间开始各省商人相继集资建造会馆,先后有山西会馆、山陕会馆、浙江会馆、覃怀会馆、福建会馆、两广会馆、安徽会馆、两湖会馆、山东会馆、云贵川会馆、沮水会馆11所会馆建筑⁴。广西全省各府有会馆205所,其中桂林府就有68所⁵(表1.1)。清代云南府、直隶州(厅)城镇会馆计299所⁶(表1.2)。贵州全省仅江西会馆有172处,它们多被称万寿宫、仁寿宫,也称水府祠、昭武馆、旌阳祠等(表1.3)。其中处于滇黔驿道的大约有48座,处于水陆码头城镇的有55座,占全省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⁷。清军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在新疆开放商禁,允许内地商人到新疆长途贩运。清代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的各个主要城镇,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贾事业,陕西商人在新疆各地都建有陕西会馆(表1.4)。

1 数据来源:胡春煊、白鹤群.北京的会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2 数据来源:《顺天府志》《京师坊巷志坊》《都门纪略》等书的记载,转引自《前门地区的会馆建筑》。

3 数据来源: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9.

4 数据来源:王兴亚.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J].中州学刊,1997(6):121-124.

5 数据来源:侯宜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J].中国地方志,2005(7):43-53.

6 数据来源:马晓粉.清代云南会馆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7 数据来源:李储林.明清贵州江西会馆地域分布及形成机制探析[J].建筑结构学报,2015,32(2):8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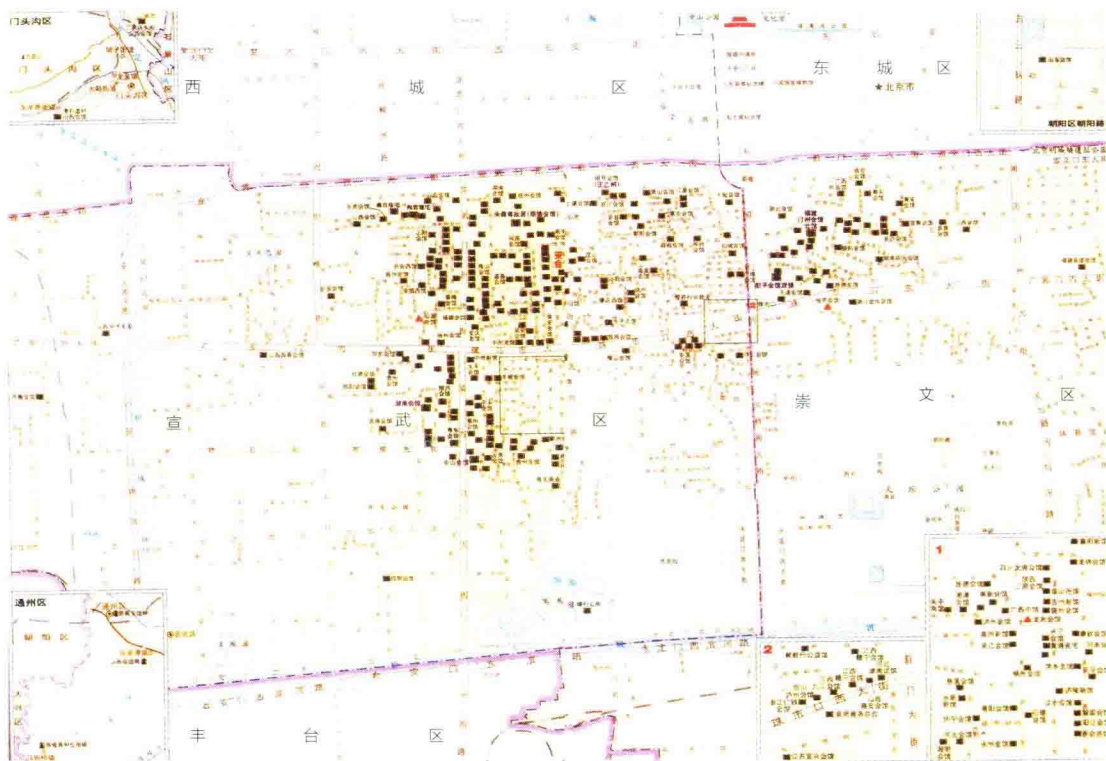


图 1.1 北京前门地区历史上的会馆分布图

图片来源：罗虹,北京会馆建筑遗存研究[D],北京:北京建筑工程学院,2004.

底图来源：《中国文物地图集 北京分册(上)》(京S〔2008〕030号)

表 1.1 清代广西各地会馆分布与数量统计表

	广东籍会馆	湖南籍会馆	江西籍会馆	福建籍会馆	其他省籍会馆	小 计
桂林府	11	22	21	1	13	68
平乐府	14	5	3	3	3	28
梧州府	14	—	—	—	2	16
郁林府	3	—	—	—	—	3
潯州府	7	—	—	—	—	7
柳州府	11	6	5	1	5	28
庆远府	4	3	1	1	2	11
思恩府	3	1	1	1	4	10
南宁府	10	1	1	1	6	19
太平府	7	1	—	—	—	8
镇安府	2	—	—	—	—	2
泗城府	5	—	—	—	—	5
合 计	91	39	32	8	35	205

资料来源：侯宜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J],中国地方志, 2005 (7):43-53.

表 1.2 清代云南府、直隶州（厅）城镇会馆分布与数量统计表

府州 会馆	云南府	大理府	临安府	楚雄府	澄江府	顺宁府	丽江府	曲靖府	普洱府	永昌府	昭通府	东川府	开化府	广南府	其他
省外	16	12	18	13	1	15	5	11	5	14	63	23	22	15	23
省内	2	3	3	0	0	4	0	0	2	7	0	0	0	0	0
行业	10	1	0	1	0	0	0	0	0	2	3	0	0	0	0
合计	28	16	21	14	1	19	5	11	7	23	66	23	22	15	23

资料来源：马晓粉.清代云南会馆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表 1.3 清代贵州江西会馆分布与数量统计表

序号	分 布		数 量	序号	分 布		数 量
1	贵阳市	云 岩	1	22	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	黎 平	2
2		花 溪	2	23		榕 江	2
3		开 阳	1	24		从 江	2
4		修 文	4	25		丹 寨	2
5		息 烽	2	26		镇 远	4
合 计			10	27		凯 里	1
6	毕节市	织 金	1	28		黄 平	7
7		黔 西	8	29		岑 巩	7
8		七星关	1	30		麻 江	4
9		威 宁	1	31		雷 山	1
10		金 沙	2	32		三 穗	3
11		赫 章	1	33		剑 河	3
12		大 方	1	34		台 江	1
合 计			15	35		天 柱	2
13	遵义市	正 安	1	合 计			41
14		遵 义	2	36	安顺市	西 秀	5
15		桐 梓	4	37		镇 宁	1
16		绥 阳	1	38		紫 云	1
17		仁 怀	5	39		关 岭	1
18		赤 水	2	40		普 定	1
19		道 真	1	41		平 坝	3
20		务 川	1	合 计			12
21		湄 潭	9	42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都 匀	4
合 计			26	43		贵 定	2

续表

序号	分 布		数 量	序号	分 布		数 量	
44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独 山	2	57	铜仁市	思 南	2	
45		龙 里	4	58		玉 屏	4	
46		福 泉	1	59		江 口	4	
47		三 都	1	60		印 江	1	
48		惠 水	3	61		德 江	2	
49		荔 波	1	62		沿 河	1	
50		长 顺	4	合 计				24
51		瓮 安	4	63	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兴 义	3	
合 计			26	64		兴 仁	3	
52	六盘水市	六 枝	4	65		册 亨	2	
53		盘 县	2	66		晴 隆	1	
合 计			6	67		普 安	1	
54	铜仁市	石 阡	4	68		安 龙	1	
55		碧 江	2	69		贞 丰	1	
56		松 桃	4	合 计				12
总 计							172	

资料来源：李储林，明清贵州江西会馆地域分布及形成机制探析[J]，建筑结构学报，2015，32(2):80-83.

表 1.4 清代新疆地区山陕及陕西会馆分布与数量统计表

地 点	会馆名称	创建及沿革
乌鲁木齐	关帝祠	不详
巴里坤	山陕会馆	不详
乌鲁木齐	乾州会馆	建于老东门
玛纳斯	陕西会馆（会宾馆）	建于光绪十九年（1893 年），供文王周公
奇 台	陕西会馆	建于清末，砖石结构，有门楼、戏台、大殿、钟鼓楼

资料来源：李刚，袁娜，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商帮的发育也使得明清以来商人群体将会馆这种形式带到全国各地。如清乾隆年间泌阳县《重修关帝庙碑文》称：“秦晋商人贾中州甚伙，凡通都大邑皆会建关帝庙。”根据相关研究统计，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其分布状况（图1.2、表1.5）。

不仅大城市会馆林立，那些处于区域水路交通线上枢纽位置的商贸集镇以及拥有独特资源产业的城镇，一时间也是会馆众多，不胜枚举。根据张笑楠的研究，“河南省位于水陆交通要地的商贸城镇，如洛阳、周口、社旗、朱仙镇、北舞渡、荆紫关等地，都拥有大量会馆”，总计超过百所¹。江苏淮安地处黄、淮、运三河交汇处，是南北要冲及大运河航道上重要的河、漕、盐关重

1 数据来源：胡春煥，白鹤群，北京的会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地，清代曾建有10座会馆（表1.6）。湖南省怀化洪江镇，地处西南同华南交界的水陆交通要道上，是湘西南重要驿站和繁华的商埠，全国竟有10省20府80余县先后在洪江建立会馆多达数十所。徐州窑湾古镇西依大运河，东临骆马河，在清代至民国年间，曾设有“山西、山东、福建、江西、河南、河北”等八省会馆。辽宁海城的会馆多建于清康熙时期，主要有建于海城城内的山西会馆、山东会馆[乾隆元年（1736年）]、直隶会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建于牛庄城内的冀甯青扬会馆，建于腾鳌镇内的山东、山西、直隶三省会馆[乾隆元年（1736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不同，会馆设会目的的不同，服务人群的差异，会馆的类型也多种多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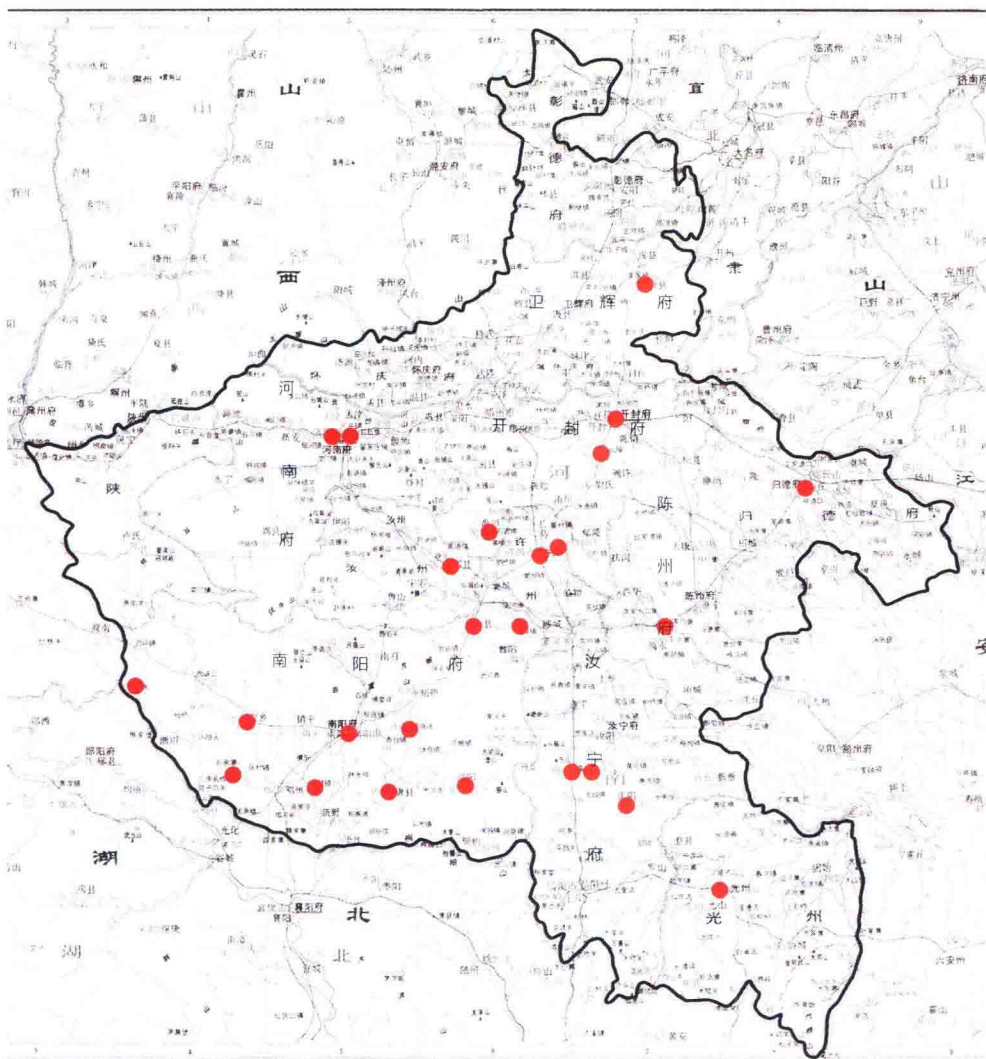


图 1.2 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河南分布图

图片来源：阮乐乐.明清时期陕商会馆的地域分布及兴衰嬗变[D].西安：西安工业大学，2017.

底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2）——明时期图组（GS〔2006〕380号）